

石窟寺景区理应坚持“保护第一游览第二”

■广西 苑广阔

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合理测算、从严设定石窟寺景区游客承载量,将核心景区承载量、重要区域(如窟前平台)承载量、各开放洞窟承载量、栈道/游步道承载量、重点洞窟和栈道瞬时承载量等列为“硬指标”。

从旅游景观的分类来说,有山水风光类的,历史人文类的,风土人情类的,民族民俗类的等等,当然了,在实际旅游过程中,某个旅游目的地不会这么泾渭分明,而是各种景观融合在一起。而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之所以要把石窟寺景区单独拿出来,要求给予特别的保护,根本原因就是石窟寺景区有自己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石窟寺景区一方面往往是国家、省级、市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身就应加强保护;另一方面,不管是石窟、摩崖造像、摩崖石刻,经过几百上千年的风雨侵蚀,岁月洗礼,往往变得十分脆弱,而“全民旅游时代”的带来,从保护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必须被重点强调才行。

对于旅游景观,不管是自然风景类的,还是历史人文类的,都应坚持“保护第一,开发和利用第二”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往往会与这样的要求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是完全颠倒过来,成为开发和利用第一,而保护则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对于一些自然恢复比较好的旅游景区景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一旦造成损毁和破坏,就难以再恢复的景观,这可能就是灾难性的。而石窟寺景区,恰恰属

于此类。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某景区一个靠近游客过道的佛像突出部位,被来来往往的游客摸得油光锃亮;水中的某个石像,又被游客抛出的硬币砸得坑坑洼洼。这至少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景区的经营管理者,没有尽到必要的保护责任,没有让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受到应有的保护;二是部分游客的文明素质,确实有待提高,他们不理解文物的价值,不懂得人文的意义,任性之下,最终伤害的,却是这些历史人文古迹。最重要的是,对于石窟寺景区而言,一旦其中的历史建筑、文物遭受了破坏,这种破坏就是不可逆的,即便可以通过后期的修复达到所谓“修旧如旧”的程度,但修的终究是修的。

我国现有石窟寺(含摩崖



石窟寺景区

造像)519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45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10处石窟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尽管近年来我国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但在节假日、旅游旺季部分石窟寺和世界文化遗产地游客超负荷,对文物和游客

安全造成一定风险。对此,《通知》明确要求,要采取网络预约、电子票务、错峰参观、限时限流、定制服务、实时监测、预警上报等方式,调节控制游客量,严格落实游客承载量各项指标,有效降低破坏行为发生的概率。这是我们可以做好,也是必须做好的。

徽章见证历史:从导淮高级水校到华东水院



导淮高级水校校徽



导淮委员会证章



“河海”校徽纪念章



淮河水利工程总局证章

■安徽凤台 郭毅挺

不经意间,偶得一枚“水利”徽章:圆形,面红蓝白烤漆彩,铜质鎏金,周围由中国传统的“工”字纹所环绕,凸立三足宝鼎位居中央;正面铭文“水利”二字,背铭数字编号。整个徽章造型彰显霸气,大有大禹举鼎之雄势,民族不屈精神也充满其间。

经过多年仔细查证,此章系“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校徽。

穿过时空隧道,来到了硝烟弥漫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正被日本鬼子的铁蹄所践踏。而就在这之前的一个月,由于战局急变,国民政府机关纷纷撤退到西南重镇山城重庆和周边的一些地区。在这次又遭受外族入侵而又被迫西去的国家职能部门中,就有当时原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导淮委员会。

导淮委员会于民国十八年(1929)7月1日成立,成立之初直隶国民政府,主要职责是导淮,并有《导淮工程计划》及相关配套措施出台,对当时多灾多难的淮域水患治理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无奈抗战军兴,终成憾事。

导淮委员会战时受命,由一支治淮的专业职能部门瞬间变成了治江通航的工程队伍,

随之成立导淮委员会淞江工程局,局长沈百先、总工程师须恺。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即迁转到四川淞江地区。此后,在淞江上修了一期严、信、智、仁、勇闸坝和二期中、华、常、胜、利、民闸坝以及三期族、庆、复、兴闸坝的部分工程,为抗战转运战略物资提供了很大便利。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导淮委员会未雨绸缪,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3月,在淞江大长滩以导淮委员会与教育部合办之名,创建了“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校长由沈百先局长兼任,“水利”校徽就此面世。

至于“河海”,则是清末状元张謇为缓解民国初期导淮施工人才匮乏,于民国四年(1915)在南京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简称。首任校长许肇南,学校隶属全国水利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培

养水利技术人才的学府。民国十三年(1924)东南大学合并到“河海”,随改称河海工科大学,学校仍隶属全国水利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的水利高等学府,对我国的现代水利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起着开拓和推进作用。民国十六年(1927)“河海”合组到第四中山大学工学院,原“河海”的最后一届学生,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从中大毕业。从此,“河海”便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民国“黄埔”为中国造就了一代善战将帅,民国“河海”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精英水工,这些都为世人所称道。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外族入侵而抵御的首次伟大胜利。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天,导淮委员会随国府返京的队伍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民国首都南京。而为储备导

淮人才开设的“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也跟着导淮委员会从淞江迁到了离南京较近的镇江金山酒精厂暂商借的校舍上课(因京城未有校址),校长仍由沈百先兼任。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暑期开始,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秋,学校克服重重困难在镇江连续招生4届正科、3届高级训练班、1期补习班(预备班),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新中国的治淮和水利建设。1949年2月,学校终由镇江搬迁到南京模范马路2号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内继续上课。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国民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校名一度曾更名为“国立水利工程学校”。8月,军代表宣布“国立水校”解散!而此时,恰好苏北沂沭河流域遭受重大水灾,正亟需水利技术人才,经许永嘉老师多方联系协调,于8月底师生们在许老师带领下携仪器、图书等转去苏北建设学校。“淮局高级水校”师生到苏北后,苏北行署专门在高邮乾明寺内成立“苏北建设学校水利科”,派干部金左同到高邮主持校务。1949年10月,在南京又成立了隶属新中国水利部的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局长刘宠光。在刘

宠光局长提议下,1950年4月,原“淮局高级水校”的师生们终又重返南京与华东水利部水文技训班合并,成立“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校长由刘宠光局长兼任,隶属“淮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单科性水利专科学校。

1950年夏,淮河流域的水灾异常严重。是年11月6日,中央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基础上,于安徽蚌埠成立了直属中央政务院的治淮委员会。由于行政组织的变更,淮河水专改隶华东水利部,1951年8月又更名为“华东水利专科学校”,校长由刘宠光兼任。虽在极短的时间里,校名不断更迭,可学校的宗旨却始终未变。

1952年9月在全国院校调整中,华东水专部分师生(另中专类组建“华东水利学校”,后原大部分中专生又入华东水院)与合并来南京的华东区其他高等院校水利系科,在华东水专的南京清凉山麓新校址基础上组建“华东水利学院”,首任校长钱正英。其后学校造就的莘莘学子遍布中国的江河水利系统,为新中国的治水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1985年9月,华东水利学院又更名为“河海大学”,“河海”成为中国最高水利学府。



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校徽



华东水专护校纪念章



华东水利学院校徽



华东水利学院毕业纪念章